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ZHE JIANG SHENG BO WU GUAN DIAN CANG DA XI

长夜破晓

CHANG YE PO XIAO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长夜破晓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夜破晓 / 浙江省博物馆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 3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ISBN 978-7-80715-446-4

I. 长… II. 浙… III. ①文物—简介—中国—近代
②文物—简介—中国—现代 IV. K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139 号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长夜破晓

浙江省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朱艳萍 张 姣 方 靓 杨少锋
艺术总监 朱艳萍
美术编辑 刘 欣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446-4
定 价 188.00 元(平)

序

浙江省博物馆创建于1929年，初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多个馆区分布于杭州城市中心，包括西子湖畔的孤山馆区、大运河边的武林馆区、老和山旁的文保科研基地、栖霞岭下的黄宾虹纪念室和昭庆寺东的沙孟海旧居等，展示着浙江自古迄今优秀的传统文化，彰显着一种开拓进取、历久弥新的浙江精神。

自建馆以来，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藏品总数已近十万件。其中，以稻作文化为基础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实证文明起源的良渚文化玉器，“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文化遗存，支撑“瓷器之国”的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装点“东南佛国”的五代两宋的佛教文物，以及南宋时期的金银货币，汉代会稽镜，宋代湖州镜，古代漆木器等，不仅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而且还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此外，历代名家书画、玺印，现代革命文物等，也都是影响浙江乃至中国历史，推进文明进程的宝贵遗物。

为发挥藏品的作用，本馆除了在省内举办各种陈列、展览外，还曾在全国各地和德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展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文物艺术品，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各种反映本馆藏品的专著和图录亦陆续出版，对繁荣文化事业、推动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陈列展览不仅内容有限，而且难以与人朝夕相伴，既往的出版物又未能全面、系统展示本馆藏品的基本面貌，所以，在信息化的新世纪，我们以图书为载体，将本馆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编辑成《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十二种出版发行，以冀使更多的人了解浙江的历史与文化，准确地掌握本馆藏品的基本信息，促进展览交流、学术研究、艺术鉴赏，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和精神的累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物艺术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仅是逝去时代各种信息的载体，而且对当今社会的进步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其固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浙江省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的出版，意义正在于此。

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陈浩

目 录

序/001

综述/004~015

风雷激荡/001~044

反抗西方侵略/003~014 太平天国运动/015~027
维新变法思潮/028 民主革命的勃兴/029~044

世纪曙光/045~080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047~064 衙前农民运动/065
国民革命运动/066~080

星火燎原/081~096

农民武装暴动兴起/083~086 红十三军的创建/087~088
抗日先遣队的斗争/089~092 红军挺进师的游击战争/093~096

抗日烽烟/097~142

九一八事变/099~106 七七事变/107~114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15~120 敌后抗战与根据地建设/121~131
浙江抗战的胜利/132~142

走向解放/143~185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145~146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47~162
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63~173 解放与新生/174~185

图版目录/186~189

后记/190

综 述

□晏 东

在如林的世界民族里，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然而到了近代，这个曾经拥有“强汉盛唐”、“康乾盛世”的泱泱大国，在领世界风骚数千年之后，开始逐渐衰落。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110年屈辱、多难的历史。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110年，是中国从极度衰败、备受屈辱到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社会发生沧桑巨变的历史时期。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习俗到民族心理，从国内生活到对外关系，中国开始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迈进近代文明。曾经有多少豪杰志士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奋力拼搏，他们的光辉业绩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勇前进。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虽屡遭外敌入侵，但仍能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历史是一面镜子，回眸这段历史，将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深刻地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一、西方的侵略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1840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亚洲。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转折。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的武力较量和竞争。对于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相异的西方世界，中国人有了最初的认识，那就是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不可否认，清军武器的极端低劣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武器低劣的背后是清廷政治的腐败，政治腐败的背后是封建社会的极端落后。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古老王朝传统农业文明的胜利。

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这一过程起初表现得非常缓慢。英国人凭借“合法”的条约获得觊觎已久的权利（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屋、传教自由）。国门洞开之后，是领土的被蚕食和主权、利权的沦丧。清朝官员董宗远在上奏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2〕}

《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相对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有自己的独立主权，实际上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逐渐深化。而庚子事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质的变化。半殖民地的深化在这里表现为半殖民地制度的确立。这集中体现在《辛丑条约》的12款和19个附件之中。赔款数量之巨（赔款多达白银4.5亿两，加上39年期限中应付的年息，总数在9.8223亿两以上），主权丧失之大（外国取得在中国合法驻兵的权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班列六部之首），民族耻辱之深（列强指名严惩一批朝廷重

臣)⁽³⁾，为此前所未有。而慈禧对列强表达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⁴⁾，更体现了一个没落王朝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不平等条约像一条条屈辱的绳索，使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被控制，大量的财富被掠夺，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难。这些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西方列强的入侵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给了中国人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对这个新世界，中国人并非毫无觉悟。一次次抵御外侮战争的失败，领土的蚕食，主权的沦丧，使得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西方存在的巨大差异，中华民族开始了艰难的觉醒历程。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既是指近代中华民族摆脱小农文明、夜郎自大的状态，重新认识世界和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又是指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主、富强、进步而进行艰难探索的过程。在鸦片战争后，能否认清中国传统式的农业文明与日新月异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差距以及如何尽快缩短二者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的近代化，是实现民族觉醒的关键所在。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觉醒的状态与程度是不一样的。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中国人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最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而后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⁵⁾。梁启超的概括，从内容上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三个层次。

中华民族觉醒的第一个层次首先是从器物上认识到不足，而后有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进步。早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开明官员从时局中有所醒悟，开始冷静地观察和了解外面的世界，认真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是系统阐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⁶⁾的思想。遗憾的是这些思想没有改变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虚骄。鸦片战争的炮声，并没有唤醒昏聩的统治者。中国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丧失了20年宝贵的光阴。

20年后，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带给统治者的是更加震撼的巨痛。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⁷⁾，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这时才真正上升到实践层面。洋务派经过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不仅引进了西方的机器生产，兴建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建了新式的近代海军，而且适应军事工业的需要创办了一批近代科技、文化、教育设施。所有这些，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星星点点的近代文明。而作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机器生产的引进，更是成为民族觉醒的重要指标和重要见证。

然而囿于历史条件和民族整体的认识水平，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民族觉醒只能说是蹒跚起步。首先从民族觉醒的主体来看，承认中西方差距的主要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很小部分开明官僚。大部分的顽固派仍然浑浑噩噩，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不仅如此，他们更是百般阻挠洋务派有限地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对西方先进机器和技术的引进，可谓步履维艰。其次，从民族觉醒的内容来看，对中西方差距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之初就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⁸⁾洋务派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⁹⁾来达到图强御侮的目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¹⁰⁾。因此，洋务派对西方的学习，还只是停留在文化表层，即以坚船利炮为核心的西方物质文明。尽管这迈出了民族觉醒的艰难一步，然而这种枝枝节节的改革，“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¹¹⁾。

中华民族觉醒的第二个层次是从制度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后有了政治制度上的革新。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¹²⁾巨大的战争创伤，苛刻的议和条款，深重的民族灾难，亡国灭种的危机，促使中华民族开始猛醒。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于是，强敌成为榜样。维新派开始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框架，要求“变器变道”，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封建政体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它力图将中国建设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全面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尽管戊戌变法仅存在了103天，它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也很有限，但是它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无疑在中华民族觉醒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的光环暗淡了，封建伦常名教的权威动摇了，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思想解放后迸发出来的能量是无限的，中国社会变革的

步伐像飞驰的列车，势不可当。

当愚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面前屡屡丧失了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机会时，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就成了新一代仁人志士谋求救亡图存的新的道路。以孙中山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里毅然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充分保障民权，这是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的觉醒。

改良和革命作为制度革新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和平的渐进的道路，一条是暴力的激进的道路。当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革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是对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的否定和发展。他们把学习西方从文化的表面层推入了中间层，即非物质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这既是中华民族觉醒在前一层次的继续，同时更是前一层次的深化和发展，从而开辟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的阶段。

中华民族觉醒的第三个层次是从文化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后有了对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辛亥革命后，清朝皇帝虽然退位了，但是民主共和制度却并没有“顺其自然”地登基。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虽未得逞，但是封建专制仍然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政治形势背离人意，甚至连中华民国的招牌都有不保之势。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由器物（科学技术）到制度（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国家贫弱落后的面貌仍然没有大的改变，民族的危机依然深重。其中的根由何在？鲁迅在小说《药》中所描绘的普通民众对革命的冷漠以及麻木，用蘸了辛亥革命烈士鲜血的馒头当药，反映出国民心理的病态，这是用药难以疗治的。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认识到“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13〕}。

正是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既破旧，又立新。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旧道德、封建迷信，立的是民主政治、新道德、科学思想。其目的就在于唤起国民“伦理的觉悟”^{〔14〕}，培养国民独立自主的人格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根除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思想，从而为民主政治提供深厚的动力，奠定中国近代化的坚实基础。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认识中西差距，探求救亡图存的民族觉醒过程中，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进而到民族文化心理层面，逐渐深化并有了质的飞跃。如果说科学技术是文化的表层，即物质层面的部分，制度是文化的中间层，是上层建筑的部分，那么心理层面则是文化的最深层，是社会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长期累积而形成并体现文化质的规定性的因素。新文化运动把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引到了文化的最深层——心理层，从而触及了中西文化差距的核心因素。新文化运动对旧礼教的批判，对新思想的宣传，对个性解放的张扬，促使中国人从以儒家为轴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从封建大家庭的桎梏中冲决出来。而这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促成了广大国民彻底的觉醒，尤其是一代青年，开始从实践中改变传统的行为模式，追求平等自由的权利，探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文化运动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和重构，是民族觉醒的最高层次。只有此种意义上的觉醒，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和中国人，也才有以后的五四运动，才有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

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各式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

说……”⁽¹⁵⁾ 各式各样的“主义”寄托着各种各样的信仰，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新思想的传播，从而形成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中国先进分子，随着公理战胜强权观念的幻灭，由此产生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各国的巨大破坏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急于寻求“改造社会”方法的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正在西欧各国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瞿秋白在1920年赴俄时曾说过：“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彻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¹⁶⁾

如果说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只是大海中的几朵浪花，那么，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则是汹涌巨浪，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数以百计的刊物大量地刊载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人在文章中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认为中国“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¹⁷⁾。当时在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非常庞杂，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等，这些都统括在社会主义的名号之下。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思想使当时的进步青年眼花缭乱，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

广大的青年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大胆地议论着，而且还立即组成各种社团，尝试着用社会主义改造旧社会，构建一个理想社会。1919年底在北京成立的“工读互助团”是当时比较突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包括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等，达17人之多。王光祈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开宗明义就点出其宗旨：“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社会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¹⁸⁾“工读互助团”的实践曾经激起过许多热血青年的希望和憧憬，但从第二年秋天开始，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和人心涣散，这种和平改造社会的实验就在内外交困中一步一步溃散了。当时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验不独此一种，其他还有新村主义的实验等，然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破产，使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用和平渐进的方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要改造社会，只能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施存统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¹⁹⁾

怎样谋全体之改造呢？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毛泽东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²⁰⁾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不仅如此，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华的友好态度更是与西方列强形成鲜明的反差。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于1920年三四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²¹⁾这与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形成鲜明的反差。苏俄对华的友好态度，使中国人在情感上更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因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而痛苦、困惑、彷徨的热血青年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不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还有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代青年如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恽代

英、林育南等，也都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但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共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有情感因素，然而更多是经过理性思考作出的选择。

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不是从学理上进行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工具，从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然而改造中国旧的社会，离不开现实的国情的限制。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国民革命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推翻旧秩序的一次尝试。它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继续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但是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根本不同，北伐胜利进行中又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曾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面貌出现的蒋介石最终叛变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革命的失败，反映了中国社会各种不同的力量对历史发展的制约。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的统治，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共产党在蒋介石的“围剿”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并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当然，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缺乏对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只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共产党内从1927年底到1934年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这些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共产党希冀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的道路失败后，一部分武装开始了在农村的发展。同城市相比，农村是落后的。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却历史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之路。因为，强大的统治势力长期占据中心城市，而农村是他们的薄弱环节。“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²²⁾。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又可以提供红军武装割据的物质基础。这样，处于统治阶级矛盾间隙的农村就成为了革命首先胜利的地方。共产党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获得了农民阶级前所未有的支持，革命力量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呈星火燎原之势。由于共产党能够采取比较正确的战略战术，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势力对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

“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贯穿于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全过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是在反抗国民党“围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1933—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左”倾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下，红军虽然经过一年浴血奋战，仍然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进行长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之路，因此，即使经历濒临绝境的万里长征之后，共产党和红军仍然能够顽强地在贫瘠的陕北生存与发展。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不同的党派、阶层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呼声。国难当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²³⁾，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国能够进行统一持久的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为了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其统治地位，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给人们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与此相对的，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在抗战中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抵御强敌。共产党坚持要求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两条截

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在经过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取得的。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都作出了巨大牺牲，胜利洒满了鲜血，和平来之不易。然而抗战胜利不久，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主张废止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争取和平建国的方针，而国民党则要继续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这是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

历经十年国内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已经日益成熟。共产党这时已能比较完全地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已能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共产党破除了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教条化的束缚，不依赖苏联的发号施令，能够独立地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在理论上，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延续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未竟的事业。同时，它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共产党日益成熟，它能够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为共产党赢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背离了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凋敝，政治腐败，物价飞涨，人民生存维艰。当共产党军队在内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内战中，国民党虽然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共产党赢得了人心，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本为处境恶劣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提出了建立一个废除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阐明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原则与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这对于一个几千年追求“大同”理想社会的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人在不懈探求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理论武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历经艰辛，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西方无产阶级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在东方文明古国生根、开花，结出硕果，这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三、近代文物的价值与功能

什么是近代文物？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文博界只有革命文物的概念，没有近代文物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相继修建了一些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保护了一些革命遗址，收藏和陈列了大量相关文物。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革命文物的概念，革命文物受到了日益广泛的重视。这种局面的出现，根源于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由于深受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影响，一部中国近代史被简化为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甚至是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促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突破以革命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体系。特别是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题，在更加广阔的范围上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中国近代史还包含着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也引起了学者们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主张改变过去的中国近代史的划分范围，即把以往划定的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更改为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现在，这一看法在史学界基本上得到了统一的认识。^{〔24〕}

史学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影响到对近代文物的界定与重新认识。传统的革命文物的概念并不能涵盖整个近代历史文物，而且事实上原来史学界所界定的一些革命运动、事件在今天得到了重新评价。因此，使用近代文物的概念统称整个近代历史时期的文物就更具科学性。根据中国近代史新的划分范围，近代文物是指1840—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的文物。1949年以来的历史文物为现代文物。无疑近代文物包含了革命文物，同时近代文物概念的运用又有助于更全面、科学地反映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全貌。

相对于古代文物精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优美的纹饰，近代文物总体上来说显得是那么的普通，以致人们往往不将其作为文物看待。然而质朴甚至粗陋的外形，并不能掩盖它们本身所固有的价值。一般认为，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近代文物也无例外地具有这三种价值。

文物是“有文之物”，上面铭刻、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利于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这就是文物的历史价值。在古代，留存下来的文字记载很少，考古出土文物对人们了解与研究过去久远年代的历史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古代文物，多为出土文物，而近代文物，则多为传世文物。由于近代资料保存较多且距离现今时代较近，近代文物对考证历史或填补空白的作用不像古代文物那样显著，但它们的历史价值仍不可低估。如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太平天国的官印、令旗、公据、门牌、执照、牙帖等，是研究太平天国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中，田凭、预知由单、完粮串票清晰地反映了太平天国在浙江地区的土地制度与赋税政策，实行的仍是旧有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照旧交粮纳税”的赋税政策。这些对全面认识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有重要的作用。又如馆藏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报案纪事》、《浙案纪略》是相关亲历者的真实记载，是研究当时革命党人斗争活动的最原始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物的艺术价值是指文物所具有的艺术风格和欣赏性。古代文物的艺术价值，主要见之于书法、绘画、佛像、壁画以及精美的青铜器、金银器、陶瓷器、玉器、漆器等。这些文物往往造型精美、质地优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近代文物中的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往往与著名的历史人物或重大的历史事件相联系，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由于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意境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馆藏清末陶焘所作《蛟川奏凯图》和《蛟门奏凯图》，是纪念浙江镇海中法战役胜利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这两幅作品又是陶焘山水画中的代表作，画风苍劲，用笔沉着，加上众多名人题名、题跋，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如馆藏周恩来为曹天风先生书行书诗联，是周恩来1939年3月视察浙江抗战时为《战旗》杂志主编曹天风所书，字体浑朴凝重、圆润遒劲，表达了“中华终竟属炎黄”的抗战必胜信念，既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又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除了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外，近代工艺品的艺术价值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如石雕、根雕、木雕、木刻、泥塑等，这些工艺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在材料、技法、工艺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文物的科学价值是指文物所反映的科学、技术水平。各种文物都是人们利用当时所能得到的材料和所掌握的技术制作出来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由手工业生产到引进西方的机器工业生产，是生产力上的重大进步。如我国旧式手工棉织机是一种全木结构的简陋工具，工作效率非常低下。“1900年日本的手拉机传入我国，手拉机在原有投梭机的经纬结构上安装滑车、梭盒、拉绳等件，‘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1905年以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的输入”，工作“效率倍增”，并很快便被仿造成铁木织机，在江浙一带普遍使用。^{〔25〕}2007年，浙江省博物馆就从江苏南通征集了一台20世纪30年代的铁木织机。近代纺织工具的革新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不仅如此，凝结在机器工业生产中的产品往往也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这些产品遗存下来成为文物，对于研究当时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具有较大的价值。

往往有论者将文物的价值与作用或功能混为一谈。严格地区分，文物的价值体现的是文物固有的属性，而文物的功能则是文物价值的体现，所反映的是文物的作用与用途。由物到文物的过程中，文物原有的用途往往发生改变。如革命斗争中的武器，近代历史上作为一种战争工具，但是成为文物之后，一般就不再具有原来的用途，而成为进行历

史教育的工具。近代文物的功能，最突出地体现在其具有的精神性功能上。

其一，近代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反抗外国侵略，救亡图存，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目标。在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中国近代，中国人民在历次反抗外敌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暴、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一致对外、共御外侮的民族凝聚力，都显示了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许多近代文物突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这种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真实的历史文物，饱含着崇高的思想情愫，同时极具直观性、生动性和感染力，是对公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如馆藏《血战大渔岛》连环图画，通过漫画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官兵与日军在大鱼山岛英勇战斗的壮烈场面。在这次浴血战斗中，六十余名新四军指战员，抗击了八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人，共击毙（伤）日伪军八十多人，新四军42位壮士壮烈牺牲，唱出了一曲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之歌。当今天浏览这本英雄画册时，日军的凶残与新四军英勇抗敌的精神将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升华，内化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

其二，近代文物是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革命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26〕}。封建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而帝国主义往往又与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共同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必然导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近代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物，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凝聚着大义凛然、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承载着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这些文物，既是革命志士革命斗争活动的真实写照，也是人们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2007年浙江省博物馆征集的林辉山中共七大代表证就能充分体现这一点。林辉山是浙江的革命老前辈，1939年在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1939年9月，林辉山等代表从丽水出发，跋山涉水，穿过日伪军的多道封锁线，辗转一年多才到达延安，一路上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中共七大后，林辉山一直珍藏着这张代表证，无论是在几千里的行军中，还是在无数次的战斗中，林辉山视它为生命。这张代表证可以说是林辉山一生革命奋斗历程的见证，从中可以看到他一生的崇高价值追求和道德风范，因此这件文物具有很好的革命教育意义与纪念意义。

其三，近代文物是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有力工具。民主和科学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固有的东西，而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民主与科学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是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明的主要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对民主与科学的不懈追求。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到洋务派的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再到对西方科学精神和思想的接受和信仰；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到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科学艰难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一部中国近代历史，也可以看成是中国人民对民主与科学不懈追求的历史。许多近代文物，既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见证，同时也是今天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有力工具。如馆藏陈虬著的《治平通议》、宋恕著的《六斋卑议》、谭嗣同著的《仁学》，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主张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变法图强的思想。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批判纲常名教，宣扬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权，反对包办婚姻和缠足，传播的也是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对于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封建迷信、愚昧思想盛行的民族来讲，今天中国社会在民主与科学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正是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结果。同时，中国在民主建设与科学发展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努力加以突破。这些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近代文物，既体现了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发展的轨迹，同时对于今天的民主建设与科学精神的弘扬同样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外敌步步紧逼入侵下，国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国家饱受屈辱，人民历经磨难。在短短的110年中，中国完成了由古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产物，近代文物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性巨变的真实写照，凝聚着先辈们反抗强暴、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遗产和精神财

富。当今世界，文化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著，成为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的力量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近代文物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馆藏近代文物概况

今人所谓的“文物”在民国时期多指古物、古器物或古代文化遗存。博物馆和民间收藏以此类物品为主。浙江省博物馆创建于1929年，初名为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民国时期，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收藏的藏品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古物类，有骨片、碑拓、书画、铜器、铁器、陶瓷器、明器、服饰、美术雕刻、经像以及古文献等；二是各种动植物标本。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旧有的博物馆进行接收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让群众了解革命历史，提高政治觉悟，近代文物开始纳入到博物馆征集与陈列展览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征集与展览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物。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浙江省博物馆开始重视对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文化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组成革命文物征集小组，或以发文的形式，动员地方广泛搜集、捐献革命文物，或深入地方，调查走访，广泛征集革命文物。其中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与保管的革命文物后来全部移交到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馆藏近代文物主要是这一时期征集的。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博物馆人的辛勤努力，浙江省博物馆的近代文物收藏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浙江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馆藏近代文物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馆藏近代文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经过几十年的累积，馆藏近代文物已达九千三百余件，其中珍贵文物六千三百余件，一般文物三千余件。这在省内是首屈一指的。馆藏近代文物的种类，有报刊、图书、文告、文件、传单、标语、手稿、题字、信件、钱币、纸券、票据、证件、印章、徽章、地图、各种武器、烈士遗像和遗物等。这么多的种类，是近代文物和古代文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也体现了近代历史的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

在众多类别中，馆藏近代图书报刊、货币、各类武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近代中国社会，各类图书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地涌现。这首先得益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兴盛奠定了技术基础；而为挽救民族危亡，宣传“西学”与革新思想，各政党、团体更是十分重视报刊、图书的启蒙与宣传鼓动作用。馆藏年代最早的报刊是清末的《京报》。《京报》由“邸报”、“邸钞”演化而来，主要刊载朝廷政事、谕旨、奏折、各部文书等。《京报》可谓中国近代报刊的雏形，馆藏共有18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出版、创办的图书报刊在浙江省博物馆亦多有收藏，如《仁学》、《三民主义》、《浙江潮》、《民报》、《民立报》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旗帜，出版发行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图书报刊。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领袖著作、共产党文件和政策的汇编以及《新青年》、《向导》、《解放》、《群众》、《金萧报》、《新浙东报》、《浙南周报》、《四明简讯》等大批的共产党创办发行的报刊。

中国近代的货币是在古代货币制度的基础上，受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制度的影响，逐步向近代化方向发展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流通的货币异常混乱，从货币形态来讲，有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并行流通；从发行机构来讲，民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外发行的都有流通。馆藏大量的近代货币中，主要有以下几类：（1）清末农民起义政权所铸铜钱，有太平天国货币“太平天国圣宝”、天地会领袖李文茂攻占广西后所铸“平靖胜宝”、浙江平阳金钱会首领赵启所铸“义记金钱”；（2）清政府发行的纸币，有咸丰年间户部管票、咸丰年间宝钞、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大清银行兑换券及各地官钱局纸币；（3）民间票号和私营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有北京聚丰银号、万义串银号银票，中国通商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众多私营商业银行发行的

纸币；（4）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发行的货币，有中国民国开国纪念币，广州政府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国民政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浙江地方银行、湖北省银行、湖南省银行、福建省银行等各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5）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发行的纸币，这部分数量较多，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政权发行的纸币，有江西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鄂豫皖苏区银行、赣东北苏区银行、闽浙赣苏区银行、北海银行、浙东银行、华中银行、东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中州农民银行、关东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发行的纸币；（6）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包括伪满洲国、汪伪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在其统治区域内发行的纸币，有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华兴商业银行、伪满洲中央银行、蒙疆银行、冀南银行发行的纸币；（7）外国货币，有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以及俄国卢布、德国马克、“北朝鲜”中央银行纸币、日本侵华期间使用的军用券和纸币。

近代中国激荡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表现为频繁的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馆藏近代武器，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的硝烟弥漫与血雨腥风。馆藏近代武器数量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类：（1）清军武器，有清末浙江海防前膛炮，象山清军沉舰上打捞起来的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浙江各地的武装斗争中使用的武器，这部分武器占馆藏武器的绝大多数，从形态上讲，有大刀、腰刀、菜刀、匕首、梭镖头、土枪、土銃、土步枪、牛角火药筒、松树大炮、檀树大炮、手榴弹等，总体来说，在国民党统治力量强大的浙江地区，革命力量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非常艰苦卓绝的；（3）革命武装缴获的敌军武器，有从国民党军队、日军、伪军缴获的刺刀、指挥刀、宝剑、步枪、手枪等。

其二，许多馆藏近代文物具有重要的价值。如前所述，近代文物的价值体现在其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上。在馆藏六千三百余件近代珍贵文物中，有一级文物48件。这48件近代一级文物是馆藏近代文物中的精华，就个体而言，每一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些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其中，太平天国的一级文物有17件，历史价值极高。馆藏的太平天国的文物数量较多，总共有一千一百余件，涉及太平天国的官制、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婚姻制度等诸多领域，可以说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丰富的实物资料。这17件太平天国的一级文物，一方面同样的文物较为稀少，另一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如李大明柴大妹合挥，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结婚证书，馆藏仅此一件；太平天国宝天义黄呈忠进天义范汝增致英法水师照会，内载浙江太平军驳斥英法水师统将要挟拆除城外炮台和城上大炮，回绝列强提出退出宁波的无理要求，是太平军反抗列强侵略的实物见证；太平天国东阳县南门卒长汪文明所管门牌册底，内载136块门牌，每块载明户主姓名、年龄、配偶及家庭其他成员，是研究太平天国门牌制度的重要史料。同样，馆藏其他近代一级文物的历史价值也很高，如《中华国货维持会致台州救国协会函》反映了浙江台州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姿态；中国共产党浙南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朱文印则是研究浙南红军第十三军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则是研究浙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文献。馆藏48件近代一级文物中，周恩来为曹天风先生书行书诗联、章太炎手书终制、章太炎自题墓碑字轴是难得的书法作品，而陶焘所作《蛟川奏凯图》、秦岐农所作《西泠悲秋图》则是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书画作品，这些一级文物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除了馆藏近代一级文物外，许多馆藏近代二级文物、三级文物和一般文物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后面将有进一步介绍，在此不再一一阐述。

其三，馆藏近代文物具有浓郁的浙江地域特色。馆藏近代文物中，除了少数部分其他地区近代文物外，绝大多数都是浙江近代文物。鸦片战争以后，浙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统治者专制、腐朽的统治，浙江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抗争，奏响了一曲曲救亡图存的英雄乐章。馆藏近代文物中，有鸦片战争中葛云飞《增辑两浙海洋图》摹本，有太平军进军浙江时期的官印、令旗、公据、门牌、执照、牙帖等，有镇海抗法战争中清军守备吴杰的铜盔和铠甲，有浙江辛亥革命志士的手稿、文献等，有反映浙江人民英勇抗战的书刊、布告、文件、证章、武器等，有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革命斗争的标语、宣言、布告、烈士遗像及遗物、各类武器等，这些文物充分展现了鸦片战争以来浙江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是浙江人民抵御外来侵略、反抗专制统治的实物见证。西方列强的侵略，一方面给浙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使浙江地区迈入近代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

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²⁷⁾。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西方资产阶级在华兴办企业的刺激，促使了浙江地区近代工商业的萌芽。馆藏近代文物中，有杭州通益公纺织厂公文套，有宁波通久源纱厂经理严渔三与和丰纱厂经理顾元琮合同草约，有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股票以及和丰纱厂开股东会纪事等，这些文物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江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经济角度展示了近代浙江社会发展方向。近代浙江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思想往往开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新思潮活跃的中心地区。馆藏近代文物中，有龚自珍诗卷，有维新思想家陈虬著的《治平通议》、宋恕著的《六斋卑议》、孙诒让著的《温州办学纪稿》，有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著的《尴书》、秋瑾著的《精卫石》弹词手稿、徐锡麟为从速举事致秋瑾函、孙中山的演讲唱片等，有反映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浙江新潮》、《教育潮》、《钱江评论》等，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青年》、《向导》、《星期评论》等，这些文物既反映了浙江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脉络，同时也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

文物收藏作为博物馆的一项基本职责，其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保护、展览文物，让实物来见证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传承中华文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处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逐步转型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这是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近代文物与古代文物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因此，“厚古薄今”就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态度。所幸的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博物馆就非常重视近代文物事业。正是几代博物馆人的筚路蓝缕与锲而不舍的努力，才有今天蔚为大观的馆藏近代文物，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²⁸⁾。如何做到这些，对博物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利用馆藏近代文物，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应有作用，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建设将为我们充分利用馆藏近代文物，发挥其作用提供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纪念馆建成后，一大批馆藏近代文物将得到陈列展示，许多将是第一次陈列展出。这对展示浙江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教育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编撰馆藏近代文物图集，是我们充分利用馆藏近代文物的又一种有效方式。相对于史学家的论著来说，近代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更能客观、直接、形象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其对公众的激励与教育作用尤为突出。因此，编撰一本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脉络的文物图集，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我们编撰浙江省博物馆近代文物典藏的目的之所在。

一本理想的近代文物图集，应该完整地展现中国近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发展的全貌。遗憾的是，尽管近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许多重要的历史实物和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这往往给编撰文物图集的编者带来很多困难和遗憾。本书的编撰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馆藏文物有限，特别是缺乏反映中国近代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文物，因此，我们只能就反帝反封建这条主线简单勾勒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并尽可能利用馆藏近代文物，展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

我们从众多的馆藏近代文物中，精选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文物三百余件，以时间先后为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将其拾掇起来，编撰了这本馆藏近代文物图集。所选文物大部分是浙江近代历史文物，因此，本书又可看作一部反映近代浙江历史发展和浙江人民为救亡图存进行英勇斗争历史的文物图集。本书共分五章，分别为风雷激荡、世纪曙光、星火燎原、抗日烽烟、走向解放。每章即为一个历史阶段，从章名中编者试图概括出这一历史阶段的主旨。章的下面分为节，每节或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概括一个历史主题，将与之相关的文物涵盖在内。限于编者的水平和能力，观点与内容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如果本书能够对读者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有所裨益，我们将不胜欣慰。